

【民族学】

剑川石宝山歌会的历史变迁及文化内涵

董秀团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中文系,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 石宝山歌会历史悠久, 但其起源不会早于石钟山石窟的修建。歌会自产生之初开始, 历经发展变迁, 大致可分为明清至新中国成立前,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至今三个阶段。歌会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其中既有原始的生殖崇拜, 也有佛教朝山庙会的痕迹, 还是白族先民农耕文化的产物, 同时也是佛教对白族地区原始信仰文化进行利用和整合的结果。

关键词: 石宝山歌会; 变迁; 文化内涵; 朝山会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09)02-0060-06

石宝山, 位于云南省大理州剑川县西南部, 是闻名遐迩的全国第一批重点风景名胜区。景区内主要有石钟寺、宝相寺、金顶寺、灵泉庵、海云居等寺宇和文物古迹遗址。其中, 石钟山石窟1961年就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有“南天瑰宝”之美誉。石宝山峰峦叠嶂, 林木葱郁, 不仅名胜古迹众多, 而且自然景观优美。一年一度的石宝山歌会就在这里举行, 届时, 每年都会吸引滇西北各地成千上万的民众前来参与。

作为滇西北民间的盛大集会, 石宝山歌会在民众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但学者对集会的关注程度则要小得多。检索研究文献, 可知现有的研究中, 对石宝山歌会进行介绍的较多, 对歌会的起源、内涵、功能、与民众生活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却并不多见。1979年以来收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篇名中涉及石宝山歌会的文章仅有7篇。其中, 对石宝山歌会散文式的抒发或描述性的介绍居多, 研究性的论文较少。相较而言, 研究石钟山石窟的文章可谓数量倍增, 一些学者在探讨石窟的同时也涉及到了歌会, 但后者并非其研究的主要内容。由此可看出, 对于石宝山歌会的学术性探讨还不是非常充分, 关于石宝山歌会, 还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空间。本文试图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梳理石宝山歌会的发展脉络, 并挖掘歌会中包含的深层内涵, 揭示歌会长盛不衰的原因。

一、石宝山歌会源起

石宝山歌会历史悠久, 这一点得到了人们的公认。但是, 石宝山歌会到底源起何时, 又是出于何因, 却一直没有定论。比较普遍的说法是石宝山歌会起源甚早, 可能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即已产生, 其山林野合之俗是原始文化的遗留。这种观点主要依据是石宝山歌会中长期保留山林野合习俗, 但仅以此为据就断定歌会起源时间, 理由似不充分。

笔者认为, 探讨石宝山歌会的起源时间, 应首先弄清歌会的性质。笔者赞同石宝山歌会本来是朝山会的说法。地处石宝山腹地的石龙村的李绚金老人指出: “石宝山歌会, 原名‘八月初一’。据传石宝山周边的沙溪石龙等地每年的白露到秋分这段时间要下冰雹, 在这期间, 丽江的雪山一露头, 剑川坝子中的大春作物就会受灾大减产。在沙溪, 20世纪50年代还坚守祖训在坝子里不能出现白的东西, 如木料、白帽白衣服, 一旦发现白的东西就严厉处罚。在此期间, 石龙还派专人到石宝山岩洞里搜查, 据传岩洞里藏有大批的冰雹。把冰雹查出毁掉, 那当年就能获丰收。八月初一是中秋时期, 如能在石宝山举行法会祈祷黑龙和菩萨保护就更好。于是, 逐渐形成了八月初一的朝山会。原本这是以宗教活动为主, 到现在, 宗教活动占一半, 八方情侣也同时到会场对调唱歌。各自活动, 互不干

【收稿日期】2008-11-30

【作者简介】董秀团(1977-), 女(白族),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2008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少数民族民歌的社会功能及传承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

涉。”^①这说明八月初一的朝山会主要目的是祭神祈福，祈求丰收，而非歌舞娱乐。学者李东红也认为：“白族语称歌会为‘观山’。‘观’有‘游览’的意思，‘山’为‘寺庙’之意。歌会实际上是朝山香会。”^[1]

既然歌会本是朝山庙会，那么对歌会的起源时间的探讨就应该与歌会的活动场所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这一朝山的香会、庙会自然与求神拜佛有关，如果没有造像，没有寺庙，朝山进香拜佛就失去了活动的场所和中介，丧失了依托的土壤，所以石宝山歌会的历史不会早于石窟和寺宇的修建。

石钟山石窟是完成于南诏后期和大理国时期的佛教石窟群。石窟内有南诏国天启十一年（公元850年）和大理国盛德四年（公元1179年）造像题记，可知石窟开凿的历史已超过1000年。石宝山寺宇的建造大概可追溯到元朝。据《新纂云南通志》记载：“石钟寺建自元代，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邑人张学诗重修，咸丰九年（1859）毁于兵燹，同治十一年（1872）重建。”而宝相寺的建造时间可能也是元代，康熙辛未年（1691）《重建石宝山祝延寺碑》载：“相传古代高僧诺巨罗尊者潜修于此，元末鹤庆知府高伦首创寺院，称‘祝延寺’。”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祝延寺毁于火，二十九年（1690）住持性珠重建，改祝延寺为宝相寺。金顶寺原称佛顶寺，是明崇祯年间京城总兵段畹返乡为母酬愿所建。海云居则是明末清初建造的。^{[2] (P764-766)}

因此，笔者认为，石宝山歌会的历史不会早于南诏时期，是伴随着石窟寺宇的兴建，朝山进香的民众日益增多，逐渐纳入了对歌唱曲娱神的内容之后才成型的。

另外，歌会中歌唱曲所用的格式为白族传统的“三七七五，七七七五”的山花体式，目前所知该诗体最早记载见于《五代会要》中南诏上大唐皇帝舅书所附的转韵诗。至明代，山花诗体在白族地区已经十分盛行。尽管《五代会要》中出现了山花诗体的记载，但诗体的出现与该格式在民间被民众纯熟地运用于对歌唱曲还是有很大距离的，这需要更长时间的孕育发展。因而，结合诗体歌词格式，也可旁证歌会的历史不会早于南诏时期。

到明清时期，歌会已经成熟，传世诗文可证当

时的歌会情景。在明代白族诗人赵炳龙所题的石宝山楹联中有一副是这样写的：“弦歌犹俚俗，亭障亦边筹。”另外，清赵联元辑《丽郡诗征》中载剑川治城人赵怀礼写于嘉庆年间的《朝山曲》七绝，其一云：“香烟喷作雾迷漫，彻夜僧寮不掩关。明月乍来还乍去，可怜佳节与名山。”其二为：“三营浪子土三弦，靡曼山歌断复连。菩萨低眉弥勒笑，无遮大会奈何天。”诗中生动细致的描述了石宝山歌会的兴盛场景。

二、石宝山歌会的历史变迁

由于缺乏文献资料的记载，对石宝山歌会数百年来变迁历史作出清晰描绘实属不易。但结合一些零星资料和民间的口述史，我们仍试图对石宝山歌会的发展历史和脉络作出勾勒。前面已经谈到，石宝山歌会的历史不会早于南诏时期，但具体是何时产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在此，我们以有据可依的明清作为起点，考察歌会的历史，则可大致将歌会的发展变迁分为三个阶段：明清至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80年代中至今。

（一）明清至新中国成立前

目前能见到的新中国成立前关于石宝山歌会最早的文字记载，就是前面提及的赵炳龙的楹联和赵怀礼的《朝山曲》。从诗中可知，当时的石宝山歌会已颇具规模，一派兴盛景象。然而考察明清时期的历史现实和社会背景，可知明朝中央集权下的封建统治较之前期更有甚之。明初，朱元璋政府曾颁布了一些摧残演艺活动和民间艺人的法令，如明洪武二十二年降旨禁军官军人学唱：“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3]但朱元璋本人对那些讲忠义、孝道、伦理的戏曲曲艺却怀着肯定的态度，他对《琵琶记》便大加推崇：“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记》如珍馐百味，富贵家岂可缺耶？”^{[4] (P214)}至明中期以后，封建高压统治进一步加强，一些民间的娱乐、集会被禁止，这其中当也包括了歌舞娱乐等活动。清朝乾隆年间曾任剑川知州的张泓在《滇南新语》中说：“州之沙溪、甸尾皆有市，悄悄长昼，烟冷街衢；日落昏黄，百货乃集。村人蚁赴，手燃松节曰明子，高低

^① 云南大学于2004年在石龙村建立了“云南大学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基地——白族调查点”，聘请李绚金作为日志记录员，记录村寨日志。李绚金曾在石钟山石窟文保所担任会计，同时研究文物和讲解，故对石宝山的历史及文化较为熟悉。此处引文采自李绚金为云南大学记录的2004年9月14日的石龙村日志。

远近,如萤如燐,负女携男,趋市买卖,多席地群饮,和歌跳舞,酣斗其常,而藉此以为桑间濮上,则夷习之陋恶也已甚……余司牧于是,其最关风化者莫如夜市,乃首禁之,立为条教,示以男女有别,出作入息之义,及违禁之罚。”^{[5](P399)}这里,在禁夜市的同时也将和歌跳舞之类的民间娱乐一并禁止了。甚至在解放前各村各寨的乡规民约中也禁止弹曲对歌。如剑川县东岭乡新仁里村的乡规里就有“有弹弦鸣曲者罚”这样的条款。

那么,既然朝廷和主流文化对对歌唱曲乃至其他娱乐所持的是禁止的态度,为何石宝山歌会却长盛不衰,还能出现《朝山曲》中所示的盛况呢?对此可以这样理解:其一,当时的民间对歌唱曲之风已经十分兴盛,乃至引起统治阶级不满,故有意制定种种禁令,然却不一定能阻挡民间的这种潮流。其二,与石宝山歌会独特的地缘和场所有关。石宝山歌会举行的场所石宝山相对封闭,且歌会不是日常性的常态生活行为,而是一年中仅有几天,不易成为朝廷禁令的焦点。加上石宝山歌会依托于石宝山中的寺庙佛宇举行,打着朝山香会的旗号,使得歌会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因而,在民间歌舞娱乐受到禁止的同时,石宝山歌会却仍能具有旺盛生命力,生根发芽。

访问大理尤其是剑川地区七八十岁的老人,大都能回忆起解放以前石宝山歌会的盛况。每到歌会,石宝山漫山遍野人头攒动,背着行李铺盖,拿着锅碗家什的人们聚集于寺庙里、佛像前、山野中,歌声此起彼伏,这种景况与今天的人们所看到的石宝山歌会确实有很大不同。

(二)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不管是口述史的追忆,还是文字性的描述,都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能够更加真切的触摸和感知。如今60岁以上的人,多数对这一段历史有着清晰的记忆。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基本沿袭了古老的赶会对歌传统,每到农历七月底八月初,石宝山周围乃至更远的洱源、大理、鹤庆、丽江、兰坪等地的群众三五成群,蜂拥而至。因为那个时候的石宝山除了寺庙之外再无别的设施,更无现在能看到的宾馆饭店,所以当时赶会的人们要自己准备好行李、炊具,菜蔬粮米。这其中,以前是一块羊皮披肩,再后来是一块塑料布必不可少,下雨时可遮雨,累了还可铺于地上在上面休息一番。很多男子还要背上一把龙头高昂的三弦,一路上,边走边谈笑,有时弹上

一曲三弦,伴着铮铮的三弦声一曲曲白族调随口而出。到了石宝山,可以选一块阵地,一展歌喉,也可穿梭于林间小道,漫步于寺宇佛前,寻找着自己钟情的对歌对象。到了夜色降临时,人们点起火把,或打着手电筒,仍旧借歌传情。那些因歌生情的男女,可能会双双隐没于树丛中,同披一块毯子,甚至是一块塑料布,互诉衷肠。每年的歌会上,都有一些人是专门来同旧时情人相会的,有的是年轻时互相爱慕,产生感情,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结合,便相约每年石宝山歌会时再度聚首。这时的石宝山歌会,是歌的海洋,也是情的世界,充满着欢声笑语,流淌着欲望情爱。当然,也有很多老人为还愿而来,还有很多小孩在大人的带领下来看热闹和新奇。很多人家则特意到石钟寺石窟中的阿妹白女性生殖器造像前跪拜祈祷,祈求生育或顺产。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有山林野合遗风的歌会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异端,受到禁止。据说,1958年石宝山歌会期间,剑川县和公社各级都派出民兵把守路口,不许群众上山去赶歌会。到了“文革”期间,石宝山歌会遭到更大的打压,长期被查禁。1975年的时候,剑川县里印出通告,四处张贴,不准群众去赶歌会,更有甚者,还派出荷枪实弹的民兵巡捕进山驱赶歌会的群众。^[6]然而,即便是如此,事实上也未能完全禁绝石宝山歌会这一盛行了几百年的大型民间集会。据老人们回忆,当时不准群众上山赶会,把守路口,人们就从小路上山。你在这边巡捕,我就到那边唱,总而言之,一定要唱。这或许就是民间艺术最大的生命力所在。

“文革”结束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石宝山歌会得到恢复,重新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和生存空间。古老的歌会基本恢复本来面目,石宝山上又飘起了无拘无束的歌声。

(三)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至今

20世纪80年代初,石宝山歌会还基本维持旧有风貌。但此时,已经出现了导致歌会变化的因子。由于政府部门越来越意识到具有悠久历史的石宝山歌会在民众中的影响和对社会的价值,但也同时认为具有原始气息的山林野合习俗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而决定加强对歌会的引导和组织工作。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剑川县文化部门在石宝山歌会期间设置了“赛歌台”,鼓励创作演唱思想内容健康的各民族民歌,积极引导对歌唱曲活动。同时,在每年的歌会上都举办有奖对歌比

赛,或者专门将那些演唱水平较高的歌手组织起来,在赛歌台上摆设擂台,对歌打擂。

这些活动无疑活跃了歌会的气氛,但也使得歌会开始悄然发生变化。政府部门的介入和引导,逐渐改变了石宝山歌会的旧有面貌和古旧习俗,石宝山歌会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原始的山林野合习俗逐渐减少乃至消失。一些年轻人不愿背着行李炊具,看到其中的商机,有的商家开始在歌会期间到歌会场地临时搭建商铺饭店,提供餐饮服务,出售土特产品。

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石宝山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外来游客的逐渐增多,当地政府部门更是将石宝山歌会作为一张富有当地特色的名片来加以打造。1999年,剑川县将歌会定为剑川法定民族节。每年歌会之前,政府有关部门就开始筹备歌会期间的各项工作,进行精心策划和周密部署。歌会节期间,政府有关部门要举办山门迎宾仪式,邀请省州县各级领导参加开幕式活动。在宝相寺停车场处的对歌台搭建大型舞台,举行精彩的开幕式演出活动,同时仍然举办对歌大赛、三弦比赛、霸王鞭表演、洞经古乐展演、民族手工艺品展示、篝火晚会等更加丰富的活动。如2004年石宝山歌会的宣传中提出了“弘扬民族文化,振兴剑川经济,展示剑川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以歌会友,以歌招商”等目标。2008年石宝山歌会则打出了“继承历史传统,弘扬民族文化,广交四方朋友,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剑川经济”的歌会宗旨。

然而,歌会期间的车水马龙和人头攒头之后,我们听到的是人们对歌会的这样评价:“现在的歌会没有以前那么好玩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热闹了,只是第一天人多,第二天第三天就逐渐少了,以前是几天几夜都热闹得很。”“现在的对歌都是在对歌台上唱,不像以前那么有滋有味了,要听真正好听的歌,还得要到山林间寻找,但这样的歌声已经越来越少了。”在这些评价中,包含着一种信息,即民众认为歌会的风貌发生了较大变化,歌会表面上是吸引了更多的外来游客,但真正和歌会联在一起的那些普通民众,歌会对他们的吸引力反而是减弱了。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也希望恢复歌会更多的传统特色,有人提出应将歌会还给民间,还原其本来面目。但是,由于在年轻一代中,会对歌唱曲弹三弦的人越来越少,加上很多文化事象一旦发生变化之后就不可能再回复到原貌,所以,还原歌会本来面目看来也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石宝山歌会将如何发展是值得引起各方关注的重要问题。

三、石宝山歌会的文化内涵

在石宝山歌会对歌唱曲的背后,蕴含着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这一点得到很多研究者的认同。但是,在歌会中,到底积淀了哪些文化因子,包含着什么样的文化内涵,却有着不同的说法。

很多学者认为,石宝山歌会是人类社会早期集会的遗迹,具有“山林野合”的遗风。有的进一步推断,石宝山歌会起始于母系氏族时代。也有学者认为,“石宝山歌会最初是白族原始的文化现象,是以信仰鸡神为标志,以女性崇拜和女阴崇拜为核心内容的宗教朝拜活动。”^[6]还有学者认为,石宝山歌会是朝山进香的庙会或香会,歌会起源于朝山庙会,本质是宗教朝山活动,它是民间崇拜剑川石窟的历史见证。^[1]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石宝山歌会的文化内涵,并不是一时一地的产物,而是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积淀的结果,因而,其中必然沉淀了多种文化因子,石宝山歌会的文化内涵也应该是多方面的。

(一) 原始生殖文化的遗留

在石宝山歌会中,直至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直保留着普遍的山林野合之风,年轻人通过对歌谈情说爱,中年人甚至老年人也利用歌会与旧时情人朋友相会。正因如此,石宝山歌会一直被看作是高歌纵情、狂欢偶合的时机和场所。这种山林野合,被学者看作是桑间濮上男女野合一类古老习俗的遗留。追根溯源,桑间濮上男女野合的古老习俗又与生殖崇拜,特别是女性生殖崇拜有关。在石宝山的石钟寺石窟中,有一窟造像一直引起人们最大的关注,该窟名为“阿媵白”,所雕刻的是一具女性生殖器造像。很多人一直为这尊女阴造像与佛教神祇和王者造像同堂共处而不解,这种现象在其他地方也是难得一见。那么,为什么在石钟寺石窟中会出现这一独特的现象呢?这无疑与当地先民原始的女性生殖崇拜意识有关。对于石宝山一带白族民众中所流行的女性生殖崇拜意识,有学者列举了多种例证,如白族民众在向阿媵白磕头之前所诵读的祭祀歌起源甚早,与白族民歌三七七五、七七七五的格律不同,且其中提到的金线蛙鼓起大腹的形态和土罐的形状与女性生殖有关;白族固有的底层文化中有女性崇拜的意识;每年歌会期间,民众到石宝灵泉祈求子嗣等等。^[7]这些都说明,早在歌会产生之前,石宝山一带及周围的白族民众中早就存在生殖崇拜的观念信仰,这种原始的生殖文化伴随着

歌会的产生和发展进入到歌会当中,成为歌会中最具特色的一笔。所以,石宝山歌会中的男女野合是原始生殖崇拜文化的一种遗留。

(二) 农耕文化的渗入

在石宝山歌会的文化内涵中,还包含着农耕文化的因子,折射出农耕文化对歌会的渗入。或者说,原始的农耕文化也是促成石宝山歌会形成的原因之一。

白族是较早进行稻作农耕的民族之一。据考古发现,洱海地区及周围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已有炭化稻。在属于铜石并用时期的剑川海门口遗址中,就有四处发现了谷物,经鉴定,这些出土谷物属粳稻类型。另据《云南志》的记载,在唐代,白族地区已经普遍“业水田”,种植水稻。当时白族民众还采用了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技术“二牛三夫制”,表明当时白族地区的稻作农耕已接近中原汉族地区的先进生产水平。

从时间上看,每年的石宝山歌会举行的时间都固定在农历七月底八月初的几天时间当中,这段时间,正逢当地民众的农闲季节,也是农忙之前的最后准备阶段,而此时恰恰是剑川一带稻谷灌浆的季节,对于当年的收成好坏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举行相关的祭祀和庆祝活动,促使农作物更好地生长,可能是歌会十分重要的目的。在很多地区和很多民族中,都存在男女野合以促农作物生长的实例。石宝山歌会中的山林野合,除了体现原始的生殖崇拜,可能也有更现实的目的,那就是通过人类的神秘生殖力量促成农作物的生长和成熟。

另外,从前面所引的石龙村李绀金老人所写的村寨日志中,还可看出歌会与农耕之间的关联。由于歌会举行前后这段时间石宝山周边的沙溪石龙等地每年都要下冰雹,造成农业减产,所以人们对白色的东西讳莫如深,要派专人将岩洞里的冰雹找到并毁掉。这样还不够,人们还需得到神灵的护佑,所以就开始在石宝山举行法会祈祷黑龙和菩萨保护。于是,逐渐形成了八月初一的朝山会,也就是后来的歌会。

因而,石宝山歌会是在石宝山周围各地的群众为了祈求农业丰收而在石宝山举行的法会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寄寓着白族民众对农业丰收的希望和企盼。

(三) 人神共娱的朝山会

前面已述,笔者赞同石宝山歌会的性质应该是

朝山香会或庙会的说法。石宝山歌会集会的地点主要在石钟寺、宝相寺等寺宇周围。而且,歌会期间各地的佛教组织、大德高僧都会云集石宝山各大寺宇,在各寺庙中开坛作法事。众多的善男信女除了前来对歌、听歌,也会随身携带香火,到寺庙中上香拜佛,参与法事。所以,石宝山歌会最早的时候应该是民间的朝山会,以祈神娱神为核心,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成人神共娱的大型民间集会。

每个亲临石宝山歌会,参与石宝山歌会的人都可能被歌会中的一个情景所震撼:人们不仅在山林中、岩洞里、巨石下对歌,人们还在寺庙里、佛像前、经堂中对歌,人们在神佛的注视和聆听中对歌。到了深夜,熙熙攘攘的人们在佛殿中铺开简便的行李,夜宿于佛像之前。在这样的情景中,我们看到了宗教和世俗最无间的亲密交融,人和神零距离的自由接触。很多地方很多民族的宗教信仰当中,都有娱神和娱人相互结合共同存在的现象,但是却很少出现石宝山歌会这样人神同歌、同眠的情景,也很难达到像石宝山歌会这样人神共娱的程度。这可能与当地信仰的主要是佛教密宗有关,也与白族民众的宗教意识和信仰态度有关。就如同白族所普遍信奉的本主也像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也可以成为被揶揄和嘲弄的对象,在白族民众心目中,石宝山中的神佛也会以宽容的态度接受人间的情爱,也会和人们一样从歌会当中得到满足和娱乐。

随着社会的发展,石宝山歌会的宗教功能有所淡化,娱人功能更加突出。到现阶段,在歌会当中又嵌入了旅游、经济等方面的功能,致使歌会中古老的文化因子埋藏更深。

(四) 佛教对原始信仰文化的利用

赞同石宝山歌会是朝山会,也就是肯定歌会的缘起与佛教信仰有关。关于佛教何时传播到了大理白族地区,说法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石钟山石窟的开凿年代南诏后期至大理国时期,佛教在大理地区已较为兴盛。据史书记载,南诏中期以后,王室成员皈依佛法,民众虔敬三宝。南诏王世隆在云南各地建大寺八百,小寺三千。隆舜以八百两黄金铸文殊、普贤二像,另铸观音金像108尊,使居民敬奉。大理国时,佛法更盛。《南诏野史》云:“思平好佛,岁岁建寺,铸佛万尊。”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载大理人李观音得、张般若师等至横山卖马,其名字中夹有“观音”、“般若”等佛教称谓,所购书籍中多有经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大理民众崇佛的盛况。

有学者指出,“在佛教传入之前,石钟山一带可能就是白族先民原始宗教祭祀的重要场所。……佛教在南诏时期大为盛行,主要方法是采取与白族固有的原始宗教相结合的方式,《白国因由》等书记载,唐贞观年间,观音从西土来到大理降伏罗刹,传播佛教,首先就是取得了当地大巫师张敬的信任与支持。佛教在石钟山一带建造石窟,正是想通过把女性生殖崇拜纳入佛教系统,使白族原始宗教祭祀场所转变成佛教的道场,使原始宗教在民间的巨大影响力转化为推动佛教传播的力量。”^[13]在佛教传入石宝山周围地区并想在此立足的过程中,恰好发现石宝山已经是当时白族先民原始宗教特别是女性生殖崇拜的重要祭祀场所和信仰场所,因而,对这一原始宗教文化进行吸收、整合,在此修建石窟造像,后来又逐渐修建各大寺庙,形成以石窟、寺庙为中心的石宝山歌会核心场所。乃至于后代形成规模性的朝山会,最后,发展成对歌唱曲为主要内容的歌会。显然,这其中,佛教的进入、扩张并整合原始宗教信仰文化是不可否认的。

四、结语

石宝山歌会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但由于缺乏

证据,不能因为歌会中有男女野合等原始生殖文化的遗留就将歌会的起源上溯到原始社会时期。笔者赞同石宝山歌会是朝山会的说法,认为歌会的起源不会早于石钟山石窟这一信仰场所的修建。当然,在此之前,此地已有白族先民的原始信仰文化包括生殖崇拜的影响和延续,但这与规模性的歌会相去甚远。直到南诏大理国时期,伴随佛教的传入和兴盛,佛教利用白族先民原有的原始信仰,在石宝山修建石窟,推进佛教信仰;元明时期又完成了石宝山各大寺庙的兴建,加之在农耕民族祈祷丰产的诱因下,逐渐产生了以烧香朝佛为表现,以祈求丰收为旨归的朝山会。朝山会最初以祈神娱神为目的,但由于其中吸收了原始生殖崇拜等内容,故长期保持着男女野合之习俗。发展到后来,歌会的祈神性质逐渐淡化,娱人因素逐渐加强。到新中国成立后,歌会的发展受到了更多政府力量的引导和介入,特别是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地政府部门加强对歌会的引导,原始的山林野合现象逐渐消失,石宝山歌会被打造成“白族歌城”、旅游品牌,对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歌会的原初文化内涵也逐渐被湮没在历史的变迁当中,成为歌会的深层积淀,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参考文献:

- [1] 李东红. 剑川石窟与白族的信仰民俗 [J]. 世界宗教研究, 2006, (3).
- [2] 云南省剑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剑川县志 [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9.
- [3] [明] 顾起元. 客座赘语 [Z]. 卷十“国初榜文”.
- [4] [明] 黄溥言. 闲中今古录 [Z]. 周贻白. 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 [5]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 (第十一卷)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 [6] 羊雪芳. 剑川石宝山歌会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社会意义 [J]. 民族艺术研究, 2003, (3).
- [7] 丁丙. 剑川石钟山石窟造像缘起蠡测 [J]. 民族艺术研究, 2002, (6).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Shibaoshan Singing Gathering in Jianchuan County

DONG Xiu - tuan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Shibaoshan Singing Gathering has a long history though not early than the building of Shizhongshan Grottoes. Its development falls into three stages: 1. the period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the period from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1980s, 3. the period from the 1980s to the present. Shibaoshan Singing Gathering is rich in cultural implications which embody the traces of the primitive reproduction worship and the Buddhist Temple Worship, and are the product of the farming culture of the Bai ancestor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rimitive beliefs by Buddhism.

Key words: Shibaoshan Singing Gathering; change; cultural implication; Buddhist Temple Worship

(责任编辑 杨镇圭)